

政治文化導論：理論 與個案研究

政治學論叢 ②

江炳倫 著

Weber
韋伯文化
良知·品味·責任

ISBN 986-7830-21-0

00300



9 789867 830210

書籍編號：X01-002 定價：300元

網址：<http://www.weber.com.tw>

政治文化導論

：理論與個案研究

作者：江炳倫

Weber's
韋伯文化
良知·品味·責任

Weber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Ltd
S Since 1998 良知 品味 責任
將學術當成一生的志業

政治學論叢 Political Science X01-002

政治文化導論：理論與個案研究

版權聲明

作者授權韋伯文化發行
©版權歸本書原作者所有

作者：江炳倫
發行人：陳坤森
出版者：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陳怡安 林彥君
客服專員：陳玉蟾
營業事業登記證字號：13118544
住址：台北縣永和市忠孝街 15 號 1 樓
網址：<http://www.weber.com.tw>
Email：weber98@ms45.hinet.net
電話：(02)22324332
傳真：(02)29242812
出版：2002 年 9 月(1-500 本)
ISBN：986-7830-21-0

◎個人郵政劃撥訂書一律九折優待，團體訂購另有優惠價格
郵撥帳號：19686241 戶名：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定價：30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新書

作者簡介

江炳倫

學歷：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政治學博士(1962)

經歷：

美國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助理研究員(1962-1963)

新加坡大學政治學研究講座 (1963-1968)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1968-1998)

現職：

中國文化大學法學院院長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專任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兼任教授

主要研究領域：

比較政治

政治發展

政治文化

政治哲學史

東南亞國家政治與文化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政治文化導論：理論與個案研究 / 江炳倫作
-- 台北縣永和市：韋伯文化, 2003 [民 92]
面；公分 -- (政治學論叢；X01-002)

ISBN：986-7830-21-0(平裝)

1. 政治制度 - 比較研究

572

91014107

目錄

第一部分 理論

第一章	政治文化研究的緣起.....	3
第二章	政治文化的意義和面向.....	15
第三章	政治文化的特性.....	29
第四章	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	45
第五章	政治文化的類型.....	63
第六章	政治文化的形成與嬗變.....	83
第七章	社經及個人因素與政治文化.....	99
第八章	發展中國家的政治.....	123
第九章	培養民主的政治文化.....	137

第二部分 個案研究

第十章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特徵.....	151
第十一章	民主政治與中國傳統文化.....	195
第十二章	印度的傳統政治文化.....	213
第十三章	泰國的傳統政治文化.....	229
第十四章	印尼的政治文化.....	251
第十五章	菲律賓的政治文化.....	275
第十六章	馬來西亞的政治文化.....	301
第十七章	文化與企業發展的關係.....	329

第一部分

理 論

第一章

政治文化研究的緣起

在政治學詞彙中，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是晚近才出現且流行的名詞。據我們所知，一九五六年美國政治學泰斗阿蒙(Gabriel A. Almond)在《政治季刊》發表〈比較政治體系〉一文，才首次採用政治文化的概念^①。然而，對人類社會的文化現象的觀察和推論，並據以解釋政治現象，尤其是其穩定或變動的緣故，卻是很古老的事。無論是我國的孔孟諸先賢，或希臘的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或是較晚近的學者如孟德斯鳩(Montesquieu)、盧梭(Rousseau)、托克維爾(Tocqueville)等，莫不皆重視人民的主觀價值觀念，據以推論政治體系的良窳，甚至設計一套方案，俾以改進或控制人民的思維取向。

試以亞里斯多德為例。他在《政治學》第八卷論國民教育篇卷首就說：「每個政府皆有其特殊的風格。政府的最初成立及其以後的賡續，皆取決於此風格。民主的風格塑造民主的政府；寡頭的風格產生寡頭的政府。進而言之，風格愈優良者，政府亦愈優良，屢試不爽」^②。依照他的看法，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塑造和訓練公民，俾皆能符合本國憲政的特殊風格和需要。

我們可以說，目前對政治文化的研究，乃是上承前期民族性或國民性許多假設推測的傳統，旁受其他社會科學理論和研究成果的啓迪，近應比較政治擴大其研究領域和尋求新的研究

變項的需要，且與新興國家追求政治民主、安定的目標亟相符合，故而發展為目前政治學科內最熱門且最具創意的概念工具之一。下面試分別敘述之。

壹、對民族性的研究

早期的思想家在談及一個國家的政治狀況時，慣常使用「民族性」或「國民性」(national character)概念。尤其是十九世紀的德國哲學家 and 歷史學家，可能是受到黑格爾(Hegel)和斐希特(Fichte)等人的影響，更喜歡以此來對政治體系的行為模式和發展程度作註釋。另外，他們或以地理環境，或以氣候，或以血統，或以歷史發展經過等等，來說明民族性形成的原因。雖然時至今日，我們還常聽到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用民族性來評論政治的得失，不過因為這個概念，一來過於籠統，其內涵甚欠明確；二來所顯示的主觀意味太重，即對某國家好感，就稱其國民性優良；反之，對某國家印象壞，便說其民族性惡劣；三，用以解釋民族性形成的因素，多證實並無客觀的根據；因此，許多較嚴謹的學者，認為它不符合科學概念的嚴格要求，已有一段相當長時間將之摒棄不用。另一方面，以整體文化為研究對象的社會人類學家，進入一個社區實地考察，對其人民的行為模式和主觀指向作有系統的整理推論，所獲得的結論，便多具有科學的實證性的基礎。不過這種工作，只能限於範圍較小的，甚至於較原始的社區。對整個民族國家，便很難從事周全和直接的研究，多數僅能根據一些二手資料和個人主觀的印象，據以對其文化或國民性作一些較為合理的論斷。舉其較為世人所熟悉者，有我國旅美學人許烺光所著的「祖蔭之下」和

《中國人與美國人》等書③，潘乃德女士(Ruth Benedict)有關闡述日本人民族性的名作《菊花與劍》④，以及鮑威爾(Raymond Baur)等人有關俄國人民族性的論述《蘇維埃系統如何運作》⑤等等。

社會人類學者從一個社區或國家人民的行為模式，抽離一套價值觀念和感情指向，稱之為文化或國民性，並假定其彼此間構成一個相關且持久的系統，以解釋和推測社會的持續或變動的趨勢，無疑地，對關心政治動態的學者來講，乃其極大的誘惑性和啓迪性。不過政治學者使用文化概念時，至少有三點與人類學者不盡相同，值得注意。一、人類學者是以整個社會文化為研究的對象，政治學者卻盡力僅把與政治行為有關部份抽離出來，使之成為一個範圍較小卻較明確的次級體系。二、人類學者所稱的文化，似乎把主觀價值指向、外在行為模式以及物品工藝皆涵蓋在內。但政治學者所說的政治文化，則僅指認知、感情和評價標準，也就是在思維運用上，先把主觀和客觀分開⑥。三、人類學者研究一個社區的文化，主要是以實地觀察所作的歸納為主。而政治學者則常借用現代問卷調查方法，企圖直接衡量出一國或一地人民思想或價值觀念的趨向。

社會人類學家所從事的是巨視(macro)的觀察，社會心理學家所做的則是微視(micro)的研究。其研究的焦點之一，是個人人格(personality)的形成與發展。倘若我們可借用心理學分析法，探知得某一社團的主要領導人的主觀指向，或證實社團中的大多數，具有某些相同的或近似的心理特徵，當可得到一個相當於民族性的概念，並以之來解釋某些特殊的政治、社會或經濟問題。例如，政治學家拉斯威爾(H. Lasswell)等人曾嘗試對各國優異分子作一系列間接的心理分析⑦；格林斯坦(Fred I. Greenstein)有專著討論人格與政治的關係的問題⑧；白魯洵(L. W. Pye)透過對緬甸新領導階層的心理矛盾和迷惘的分析，來說

明該國獨立後建國的艱辛歷程⁹。在經濟方面，麥格烈蘭(McClelland)和海根(Hagen)皆假定某些人格特徵，與經濟發展具有密切的關係，他們並探討了各國人民這些特徵所以生長或衰退的歷史和社會背景因素¹⁰。此外，勒爾諾(Lerner)認為現代化不僅是一個歷史過程，更且是一個心理歷程，人民必須先具有某些主觀的心理特徵，社會現代化才能根深蒂固¹¹。

再者，與政治文化密切相關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人民如何獲致其基本價值和觀念，也就是所謂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過程如何。在此方面，心理學亦提供了不少可供參考的理論架構和研究技術。

貳、社會學理論與民意調查

德國社會學宗師韋伯(Max Weber)對當代社會科學界具有廣泛而深鉅的影響，著作甚多，其中《基督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及《中國的宗教》兩書，刻意深入剖析價值觀念對社會制度演變的直接關係。美國社會學理論家派深思(Talcott Parsons)的思想體系，受韋伯的啓迪甚多，他的著名的理論架構，如角色分析、模型變項(pattern variables)分析、行動理論、體系理論等，都帶有濃厚的主觀成分，甚至可以說都是以價值和感情等主觀因素為其櫛底。因此，他曾經一再提示，研究社會體系時，一方面要詳細觀察外在行爲的模式及其後果(即結構與功能)，另一方面又須注意及引發並維持行爲模式的思維取向、感情和價值標準¹²。依據此一前題，一個社會體系可以被分為兩個密切相關但可以抽象地予以分開的橫斷面：一個是由各不同社會角色和機構的相互關係所交織而成的社會體系(societal system)，另

一個則是由各種相關的信念和價值所構成的文化體系(cultural system)¹³。

自從伊斯頓(David Easton)於一九五〇年代倡議用體系分析架構以研究政治生活以後，這一代政治學者，十之八九都已接受了體系的觀點，並頗自然地順著派深思的指示，從結構功能分析逐步進到文化的層面。就以伊斯頓本人來說，在其分析政治體系的第三本書，便增加一章有關文化因素的文字¹⁴。

另外，與政治文化研究甚為接近或至少密切關連的一個學術潮流，是近年來民意調查的日漸受重視及其技術的日臻完善。民意調查開始於一九二〇年左右，起初調查範圍僅限於投票選擇，後來則漸漸擴大及於各項社會和政治問題。芝加哥大學馬利安(Charles E. Merriam)教授和其同僚對芝城某些選民為何不參加投票的調查報告，實開此方面研究工作的先河¹⁵。現在由於新的統計方法和快速計算機的發明，不僅擴大了調查的領域和對象，而且在解釋分析方面，也獲致一些可以客觀資料支持的理論概說。約言之，這些理論可分為兩大部分，一是在個人層次方面，找出影響個人選擇傾向的諸種因素；一是在集體層次方面，從長期的追蹤和比較研究，以窺視整個體系變動的軌跡¹⁶。

政治文化的經驗性研究，與民意調查所進行的工作和所運用的技術，十分相似。雖然民意調查的目的，主要是要獲知當前民間的各種意見需求之分配情況，以供政策制訂參考，而政治文化研究，則企求從其中找出較為固定的模式，俾作層次較高的分析和解釋，但具理論基礎並能發展某些概說的民意調查，事實上已非常接近這個層次。因此，從經年累積的民意調查資料中，加以詳細整理比較，以引伸出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的概貌，應是頗為可行的研究途徑。

參、比較政治研究的新方向

過去二、三十年間，比較政治作為政治學科研究的一個領域，曾經發生過一次革命性的變化。約言之，消極方面，它放棄僅對憲法和政府機構作法條的靜態的詮釋，並反對把研究對象限於西歐幾個國家和蘇俄。積極方面有幾點：(1)擴大研究的範圍，對亞、非和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形態尤感興趣。(2)著重於實際行為的調查分析。(3)採動態觀點，對制度的成長或衰退，社會的穩定或動盪，尤表關注。(4)採用體系理論模型，冀圖建立有次序有系統的概說。

在此時刻，阿蒙把文化概念引介進來，杜撰政治文化一詞，並立刻成爲一個熱門的研究題目，乃是因爲它可以與結構功能分析相得益彰，有助於解釋各政治體系運作的差異，並增進我們預測政權穩定和變動的能力。

一、解釋政治體系運作的差異

尤勞(Heinz Eulau)在《政治行為論》一書中，曾強調我們可用文化作為解釋政治行為的一個重要籌碼^①。而這個籌碼在包括對全世界新興國家的比較研究時，正可適時派上用場。因爲這些國家的政府機構和法律規章，表面上看去與西方國家似無多大差異，但在實際運作上，則可能相去甚遠。我們當然可使用許多結構方面的因素(如社會經濟歷史背景等)來解釋這個差異，但文化模式的殊異，至少可列爲一個主要的變項來研究。

我們甚至可進一步把文化特徵列爲建構政治體系類型的一

個主要標準。例如阿蒙和鮑威爾(G. Bingham Powell, Jr.)便曾嘗試用政治文化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程度作為一個基本變項，把古今各種政治體系畫分為若干類型。其所謂文化的世俗化，是指人民的政治指向漸趨於理性、分析與實證。尤其是在決策過程中，放棄各種傳統勢力的束縛，注重目標與手段的關係，以及訊息的搜集、研判和實證¹⁸。於此可見文化世俗化與結構分化(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實為一物之兩面。一是內在的主觀上的變化，一是外在的結構上的變化。兩者相配合，足為衡量各國政治體系發展程度的基本變項。

二、解釋並預測政權的穩定性

政治文化的內涵之一，是人民對政府權威的性質所持的看法及對之信任的程度。有好多位學者認為，研究分析人民對權威所持的態度，頗有助於預測一個政權的穩定性。例如費納(S. E. Finer)曾把政治文化視同人民接受統治者所提出的「政治公式」(political formula)以及擁戴現行制度的程度。根據此標準，他把全球各國政治文化劃分為從成熟的至落後的五大類型，來推測其各被軍人干預或推翻的或然率¹⁹。紐德林格(Eric A. Nordlinger)認為一個民主政治體系是否穩定且有效力，最主要地，是看領導者與一般民眾對於權威的性質及其使用的目標、方法和範圍，是否具有一致的認識。如果有，政府的政策決定便能夠在主動領導與順應民意間達致一個均衡。依照他的觀察，英國可以做到這一點，法國則否，這便是兩國政治形態基本上不同的地方²⁰。

艾克斯坦(H. H. Eckstein)指出政治性的權威結構與社會上一般權威關係，在性質上必須是互相符合，政權才能有效而穩定，否則必然產生許多緊張壓力而歸於失敗。倘若家庭、學校、

工廠等都為專制的或單向的權威關係所籠罩，而政治上卻要實行民主，無異是等於在沙灘上建大廈，結果不是有名無實，便是脆弱不堪一擊。德國威瑪共和國的悲慘結局，便是一個好例證。反過來說，要在一個民主氣氛濃厚的社會結構之上，建立一個非民主的政權，恐怕也不是容易辦到的事²¹。

魏斯曼(H. V. Wiseman)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認為有什麼樣的 political 文化，就有怎樣的 political 結構。「原始文化」最符合傳統的政治結構；「臣屬文化」最適宜於中央集權的政治結構；而「參與的政治文化」最適合於民主的政治結構。政治結構與政治文化模式相符合時，政治體系就穩定；反之，便動盪不安²²。

肆、民主、合法性與制度建立

民主政治是一個理想。事實上有些國家距離這個理想近些，有些距離遠些，其原因何在？有無一個最有助於民主政治發展的文化？如果有，它的內涵是甚麼？是否須如理論家所設想的那樣，每個人都要具有現代化的觀念，並且要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抑是另一種模式？又政治文化是否可刻意加以培孕，大家可共同努力培養一個有利於民主制度建立的政治文化？相信凡關心民主政治發展前途的人，必皆十分注重這些問題。而政治文化的經驗性研究，可盼對這些問題提供至少部分的答案。

阿蒙和佛巴(S. Verba)嘗試從實地研究來探討前三個問題。他們抽樣調查了五個現行的民主國家：義大利、墨西哥、西德、美國、英國，人民的政治態度及參與政治的實況²³。他們發現一個有助於民主制度穩定運行的政治文化，並非一個全民政治欲望高漲、熱烈要求參與的文化，而是一個混和型的文化。它